

# 日本为什么没有医患纠纷

前些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日本一家电视台一场心脏手术的高清直播，感触良多。电视台不但直播了手术，而且在手术室隔壁的房间搭建了一个与现场互动的演播间，请到了日本一位德高望重的心脏外科专家和两位名人嘉宾来讲解。嘉宾问了专家很多病人家属关心的医学问题，比如，你以前有过手术失败的经历吗？再比如一个中国人会非常有共鸣的问题：当手术失败或发生意外时，病人家属来投诉、咒骂甚至肢体冲突时，怎么办？

日本专家的回答是，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因为日本的手术是完全“透明”的，当病人要进行高风险手术前，医生会很仔细地与患者和家属说明、对话，患者及家人在术前一般就已对手术了如指掌。那么，会有医院和医师故意把风险评估得很高，以便发生意外时可以推卸责任？回答是，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允许的。

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自己在上海某大医院开刀的事。当时我是头部外皮生了个脂肪瘤，医生建议做摘除手术。手术前，医生只露过一次面，十分有信心地说：“小手术，一点问题没有，明天早上8点来就行。”

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近日称，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没有数量和比例的限制，政治类、人权类社会组织“在登记管理上是平等的”。李立国这一表态是开放的、进步的，但关键还是在于实践中的落实。

对于中国必须发展社会组织的问题，100多年前梁启超在《时务报》上就有精到的论述，他在《变法通议》中的“论学会”一文中指出，中国的落后与缺乏“学会”有着密切关系。梁启超所说的“学会”，相当于今天的“社会组织”。他说：“道莫善于群，莫不善于独。独故窒，窒故愚，愚故弱。群故通，通故智，智故强。”意思是社会的良善在于“群”，人们结成各种社会组织可以互相沟通，有了沟通就变得聪明，人民聪明了，国家自然也就强大了。

也许有读者会说：“难道中国的社会组织还少吗？”有这样的疑问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中国的“社会组织”确实非常多，但是，此“组织”非彼“组织”。梁启超在《变法通议·论学会》中指出了关键性的区别：“群之道，群形质为下，群心智为上。”通过政府等权力建立的“组织”属于“形质”的层面，这种“组织”在中国不仅不缺乏，而且特别发达，中国所缺乏的是“心智”层面的“组织”。“心智”层面的“组织”是由人们按照共同的志趣、志向自由组合起来的，因而属于“民间”的，在现代就是相对于“政府组织”而言的“社会组织”或“民间组织”。100多年前的梁启超抓住“心智”这个关键点，是非常精到的。心的集合，便是自愿、自发、自由。

在一个法治社会，一切社会组织都是自由的，但也必须是登记的，由登记而区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，只有进行了登记的才是合法组织，不进行登记的是非法组织。登记有准许和不准许的选择，这是对政府的考验，衡量着政府拥抱自由的程度。社会组织也有登不登记的选择，这是对社会组织选择的考验，衡量着社会拥抱法治的程度。如果过度约束社会组织登记，使登记成为一个艰难乃至危险的进程，则一个国家难以有大的进步和发展。如果藐视乃至无视登记，“社会组织”以不登记而自得，则是一个国家法治的灾难。

这几年来，中国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增长较快，但远远不够，总体来说，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还处于低水平。梁启超曾描述一个国家发达发展社会组织后，“遵此行之，一年而豪杰集，三年而诸学备，九年而风气成”。中国真正的现代化，有赖于“遵此行之”。愿李立国的表态能促成中国形成新“风气”。

(摘自《南方都市报》5.9 顾则徐/文)

## 社会组织如何发展？

（此处为排版占位，无实际内容）

第二天上午7点半，我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手术室十分宽敞，设备都是崭新的进口货。大概躺了半小时左右，先进来两位护士问我的名字、做什么手术，再过了10分钟，麻醉师到了。他说，做全麻吧！我说，主治医生说过局麻就可以了。他回答，我是麻醉师，我说了算！

说话间，他一直在摆弄那些新医疗设备，不时询问护士他看不懂的英文单词。而躺在手术台上的我，心里却一直在发毛；他该不会给我打错了麻药醒不过来吧？两位护士则在手术室门口不耐烦地拿出指甲刀剪起了指甲，嘴里骂着主治医生为什么还不出现。到了8点半，一位护士拿起电话用上海话问医师，“你来勒啥地方额，快点过来！”

当然这个手术做得很成功。但反思其中细节，不免仍然心惊；麻醉师连全麻还是局麻都搞不清楚，医生连手术时间也能耽误，出更大的差错也不是不可能吧？

在日本，不要说手术，连体检报告医生也会给你仔细解读和建议，连微小的细节也不会放过。在中国我也经常体检，但得到的只是一张数据报告而已，怎么解读是你自己的事。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，恐怕正在这一个“交流”的死结上吧？

(摘自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关田刚司/文)

五年级是痛苦的开端；我考入了强化班。六年级，为让我考入好初中，父亲将我送往离家较远的地方上学，在校外租了间房子。读书几个月没人探望，我走了两个小时回家。见到父母时，第一句话竟是问成绩，临别还是，我意识到成绩的重要性了。

中考前，父亲那句话我今生难忘：“考不上江中（我们那儿最好的中学），你就去死，家里有药有绳……”我是含着泪跑回房间的。我不明白，考一个好高中比儿子的存在更重要？

我在父亲面前从来没有自卑，在父亲看来，只有考高分的

## 我快被逼疯了

学生才能有自尊。上高中后，我毛病百出，先是强迫症，这学期头又痛，已经痛了两次，每次痛两周，需挂一星期点滴，医生说说是压力太大造成的——我一进学校，无异于进了监狱，分外难受。

2008年元旦回家，我和父亲又吵起来了。父亲又说了那段他说了无数遍的话：“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，早点死，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泪……”我实在无法忍受，说了句心里话：“没有你，我不会这么差。”换来的只是嘲讽。叔叔说应多鼓励我，父亲拍案：“他不是那种人，跟畜牲还讲鼓励……”我出了屋。

父亲与老师只要成绩，我的感受却无人问津。班主任常打电话给父亲让父亲给我施压，我每次向班主任说真话换来的只是怀疑与鄙夷，她只看到我成绩的下降。

有天我带了本《莫泊桑小说集》到班上，被没收。班主任说，没把成绩搞上去不允许看，这些书只会让人越来越颓废。第二天下课我翻了翻《雅舍小品》，又被没收。班主任甚至不允许我写小文章，认为语文老师未作要求而学生去写是浪费时间。

隔了一两天，班主任打电话给父母，父母来了。班主任说我头痛是因为小说看多了。我无言。“你不想参加高考？说实话。”班主任问。

我踌躇再三——“不想！”我不该说真话。“收拾书包回去……回去你也别想活！”听着父亲的这句话我冲出了办公室。我受够了！我当时心跳加速，有些颤抖，接着做了出乎自己意料的事——跑回教室，将教科书全部扔到了楼下！我真的受够了……

(摘自《中外文摘》第5期 章锐(高三学生)/文)

## 应该让“文革”史进入教科书

不可否认，在众多年轻人心目中，“文革”已经成为一个被全然忘却的历史符号——能记住这个符号，就已经不错了，很多人连这个符号都忘掉了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“文革”竟然以一种全然正面的形象，进入年轻人的视线，尤其是一些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的视线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“文革”就是一场人民群众痛打当权派的运动，以致一些人因为对时下贪腐现象的不满，错误地呼唤“文革”的复归。

事实告诉我们，即使在21世纪，中国产生“文革”的土壤仍然还在。如果没有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清理，“文革”是不会真的退出历史舞台的。事实也告诉我们，“文革”不仅仅是一些人的怀旧情绪，还是某些野心家可以利用的资源。真要是找对了火候，煽动起类似“文革”的情绪，的确可以造成某种民粹式的声势。西方二战大屠杀的历史，过去的时间比“文革”还要长得多，但是，不仅各种纪念馆年年对游人开放，各种纪念文字、电影、电视作品，年年一年地在反思，各种层次的历史教科书，也从来没有放过这段

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，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富商当官，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，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，民间传说，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。明政权定都南京后，要修筑城墙，财政捉襟见肘，于是，沈万三出巨资，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，还献出白金2000锭，黄金200斤。

有一次，君臣闲聊，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，愿意拿出一笔钱来搞劳三军。

朱元璋冷冷地说：“朕有兵马百万，你搞劳得过来吗？”沈万三应声答道：“我每人搞劳一两黄金如何？”

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，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元璋阴险的莫测变幻。

《明史·后妃传》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，朱元璋与马皇后的交谈：皇帝忍着怒气说：“一个匹夫要搞劳三军，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，朕一定要杀了他。”

中国的每一个朝代，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，任由工商自由，恢复民间元气，明代也不例外。朱元璋登基之后，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，减轻民众负担，同时还明令不得扰商，官府不能低价强买民物。

然而，当政权稍有稳定，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。每次朝代更迭，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。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：“元氏懦弱，咸福下移，驯至于乱。”也就是说，中央集权涣散，民间的势力强大，才造成了祸乱。因此，当他听到沈万三要搞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，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。对于商人阶层“先用之，后弃之”，朱元璋非第一人，前可见两汉的刘邦、刘秀，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，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“秘籍”。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，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。1373年，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充军云南，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。

《明史·纪纲传》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：朱元璋驾崩后，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，是为明成祖。纪纲是朱棣心腹，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，此人极善敛财，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，将其资产全部抄收。当时，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，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，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，爬着去求见纪纲，进献了黄金、龙角等珍贵之物，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，年年供奉，岁岁孝敬。

一个时代或国家，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，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：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，是站着的，还是坐着的，或是“跪”着的。从沈万三的“搞劳三军”，到沈文度的“蒲伏见纲”，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，可见一斑。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，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。(摘自《浩荡两千年》中信出版社出版 吴晓波/文)

惨史。可是，“文革”不仅在各种出版物上不见踪影，连一个纪念碑都没有——巴金先生生前多年呼吁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，却始终没有影子。从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上，“文革”仅仅是一段很短暂的抽象表述。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，绝不可能通过封存一段历史，就可以忘却这段历史，然后还可以让这段历史不再重演。要吸取历史的教训，必须反复告诉我们的后代，曾经发生过什么。它们不应该是教科书上轻描淡写的段落，而应该是整个民族，一代又一代人，尤其是对历史知之不多的年轻人，必须了解、反思和直面的过去。当务之急，是马上动手充实我们的教科书，把现有研究已经证实了的“文革”的史实，原原本本地告诉后代，不要只是抽象的几句话，而是有血有肉的历史描绘，有具体数据的历史事实。不要让我们的后代，再误以为“文革”是一种美好的经历；让很多对“文革”怀有理想化情结的人们，逐步认清“文革”的真面目。(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5.9 张鸣/文)

## 造反者的「秘籍」：先用之，后弃之

（此处为排版占位，无实际内容）

# 陈方：无线电爱好者“远征”黄岩岛

从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的时间里，江苏省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秘书长陈方两度登上黄岩岛，一共在岛上作业13天。对于他来说，对黄岩岛的关注并不仅限于爱国情结，更是一种情感上的牵挂和羁绊。“BS7H”呼号 来自黄岩岛，来自中国所谓“DX远征”，英文为“DX-pedition”，是无线电爱好者把远程通信的无线电缩写“DX”和单词“expedition”组合而成的，指的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，为了远距离通信活动，来到一个业余电台十分稀少的地方进行操作，简称“DX远征”。

陈方介绍，在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界，有一个大家认为最公正的“游戏”——“DXCC”。“DXCC”指的是“联络百个远距离电台俱乐部证书”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能联络到100个“DXCC前缀表”中的国家和地区的业余电台，便有可能获得该证书。该证书由美国无线电转播联盟颁发，在业余无线电界影响最大。如同集邮一般，世界无线电业余爱好者迫切地想与来自“DXCC表”中的每一个地点进行无线电联络，或者亲自到那些人迹罕至的“DXCC实体”去操作业余电台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，没有进行过业余电台远征活动的岛屿已经所剩无几，地处偏远、人迹罕至的黄岩岛，便是其中之一。在“世界DX联络期望值排名”中，黄岩岛始终高居前三名。

经过我国有关部门批准，1994年，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组建了“国际联合DX远征队”，陈方的哥哥陈平，时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，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队员，参与到了为黄岩岛争取“DXCC呼号”的第一次远征行动中。可是，由于当时为电台架设平台的四条腿没有支在干地上，而是插在离岛石一米远的海水中，不

## 朱德儿媳赵力平的悲欣家事

赵力平，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1944年经组织介绍，在贺龙的撮合下，三张铺板一拼，与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结婚。

解放后，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，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，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，1988年离休。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，其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在1983年9月“严打”期间，以“流氓罪”被枪决了。

对于唏嘘往事，赵力平非常释然，“想得开很”。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，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。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，我担任组织科科长。1957年，干部支援文教系统，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，一直做了17年。那时候组织上让你上哪，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，让你去你就去。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，也不敢要求调动。我想调也不敢说。我爱人在北京，我在天津，这么来回跑，很辛苦。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，休一天，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。

1950年，我怀孕了。孩子降生之际，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。于是，爹爹给孙子起名“援朝”。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。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，送到了北京。一年后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。此时，双方已开始在“三八”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，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，但和平前景可睹，因而爹爹为他取名“和平”。和平刚8个月，就被送进了中南海。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，我们的周末和假期，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。朱琦在“文革”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。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，他们整不着爹爹，就拿朱琦撒气，批斗、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。1972年，恢复工作后，由于劳累，也由于“文革”这几年的折磨，朱琦患了心脏病，在家休养。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，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，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，突然感到不舒服。等我赶回家，他已经走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朱琦走时，只有50多岁。

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1983年“严打”期间，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，国华就在里面。国华1957年出生，出事时才25岁。他不是什么什么天津银行的行长，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。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。国华不爱说，不怎么出去，他喜欢画图，制作写字台、单人床，像个“小木匠”。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，地上有地毯，桌上有电视机，都没买。当时的形势是“严打快打”。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，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，肯定不会难为他，国华被推到最前面，结果其余人被放，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。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。有很多不实的传言，比如说：“邓小平找康清谈话了，做了他的思想工作。”“康清很气愤，说‘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！’”“康清去天津了解情况，想给孙子减刑。”

其实，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，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。有人说，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：“你们出了问题，不是个人的事，是在折腾你爷爷！爷爷有话在先，你们如果不争气，做了违法的事，要我登报声明，与你们断绝关系！”这话我也没听过。(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第15期 赵力平口述 周海滨整理)

算陆上操作，国际组织认为不能以此为证将黄岩岛列入“DXCC实体”。

陈平他们吸取教训，于1995年启动了第二次远征。这次远征结束后，陈平即刻赶往美国，在DX会议上首先强调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，然后就黄岩岛为什么应该被认定为“DXCC实体”进行了陈述，终于说服了在会的各国人士，承认了黄岩岛的“DXCC实体”。自此，黄岩岛终于拥有了一个被国际承认的无线呼号——“BS7H”，“B”

代表中国电台，“S”代表南海诸岛，“7”代表其行政归属海南省在我国第7区，“H”代表黄岩岛。这一呼号的取得，意义重大——从此以后，只要“BS7H”呼号在空中出现，全世界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们便能一眼看出，它来自黄岩岛，来自中国。

黄岩岛的呼号通过国际认可后，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经过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的批准，组织了第三次黄岩岛远征活动，日期被定在了1997年的“五一”。国家海洋局特意派出中国海监72.74号两搜科学考察船。这次，从小热爱无线电的陈方，毅然参与了远征队伍。

从广州出发后，经历了30多个小时的航程，船只终于到达黄岩岛附近海面。没多久，一艘菲律宾货舰悄然停泊在他们的海监72号附近。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。远征队员们按原计划乘着小腿到黄岩岛礁上去搭建操作平台。

刚开始在岛礁上工作，头顶就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，陈方看见，两架飞机正向远处的74号船俯冲而去；

（此处为排版占位，无实际内容）

## 在空中迎接中共中央副主席

1974年春，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同志在总参、北京军区首长陪同下，来承德地区视察，专机定在下午2时降落。当时我负责迎接首长的安全保卫和交通保障等工作。

在机场等候时，我手下的军官建议说，他们一直没坐过飞机，现在离首长到达还有1个小时，能不能现在上前站机在承德上空兜一下过把瘾。我们算了一下时间绰绰有余。于是，除留两名哨兵外，其余20多人都上了飞机。大家正高兴地在空中观赏承德的时候，机长突然接到电话，说首长的专机已经临空，将提前降落承德机场。我赶紧请机长降落。按规定，专机临空，其他飞机一律要回避。没办法，我们的飞机只好在空中绕着圈飞，当时我心里那个急啊。

## 蒋介石并未毒死我父亲

著名作家白先勇，日前在纪念其父的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的新书首发式上，就其父去世的种种传闻做了澄清。在他看来：蒋介石不可能派特务毒杀白崇禧，父亲的死因就是心脏病突发，他一向冠状动脉有点扩大，这是家族遗传，自己也有。

1996年白崇禧过世，关于他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，传言他被毒死，面色发绿，床头有半瓶酒，床单有撕裂的痕迹，又称医生赖少魂在他的药酒中下毒，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，趁机谋杀。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：“我弟弟看到了遗体，很平静，完全没有这些迹象。他确实是喝药酒的，没喝完的酒杯放在那里，就传出来毒药一说。那个医生赖少魂，是很有名的‘国医’，人家大‘国医’还会这样下毒吗？”

在采访中，白先勇还谈到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，“我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，一共四十年。的确，蒋很倚重他，尤其是在北伐、

然后掉头，又向72号船及正在搭建平台的3个岛礁做俯冲飞行。他们全然没有理会战斗机的一遍遍威慑，继续埋头工作。

5月1日凌晨，5艘灰色菲律宾护卫舰悄然出现在海面上，一些军人乘着橡皮艇，或干脆游到远征队员搭建的平台下方，一边查问队员们是不是军人，一边试图上岛，但遭到中国队员的严词拒绝。

临走时，陈方和其他队员分别来到3个比较大的岛礁上，举着国旗合影。其中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愿祖国更强大，我们的每一寸领土都不容侵犯！”

那一刻 成了业余无线电世界的中心 1997年的远征是极其成功的，在72小时的时间内，队员们共联络到6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0多个电台。队员们甚至不用自报呼号，他们频频改到哪里，哪里便热闹非凡，他们与每个电台的通话往往只有一两句，然后赶紧挂断，联络另一人，因为“世界在等着呢”，陈方此时回忆起来，还是一脸的自豪，“一时间，黄岩岛成了业余无线电世界的中心，仿佛我们在‘领导’世界。”

但是，1997年以后，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，黄岩岛再也没有传出任何电波。直到2007年4月，包括江苏的陈方在内的16名中外业余无线电远征队员，乘坐江苏一艘不足百吨的香港渔船，顶着剧烈的晕船反应，行程七十多个小时，再次来到了黄岩岛。从4月29日晚至5月6日晨，“BS7H”与世界各国业余电台进行了45000多次联络，在国际业余无线电界引起了巨大反响，爱好者为再次听到来自黄岩岛的叫喊而激动万分。

“其实我们最初只是为了无线电爱好而去，”陈方说道，“但我们以行动，宣示了国家主权，这点，我至今还是引以为豪的。”(摘自《现代快报》5.13 王颖菲/文)

（此处为排版占位，无实际内容）

结果，首长们1时30分降落到机场上时，机场上一个迎接的人都没有。事后，军区领导立即通知司令部召开党小组会，要我说明情况，深刻检讨，并准备接受处分。当时李德生问了一句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人告诉他详情后，李德生说：“战士们想坐坐飞机可以理解啊，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，就不一定要处理了，算了吧。”我事后反思，当领导的头脑要清醒，不能被不正确的意见所左右，误读上意。这件事后来又有人为我编成笑话——创下在空中迎接中央首长的先例。(作者周玉书中将，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、武警部队司令员)(摘自《新快报》周五书口述 田炳信整理)

对于“蒋介石派人下毒杀害白崇禧”的说法，白先勇认为这纯属是谣言。他向记者说了三点理由，“第一，散播这个谣言的人叫谷正文，他自称是蒋介石安排的监控我父亲的小组成员，但事实上那个小组根本就设这个人，而且他也没机会见到蒋介石。第二，当时父亲在台湾时没有实权的，蒋没理由杀他。第三，我父亲是在美国受过勋章的，就国际影响而言，蒋也不会杀他。”(摘自《扬子晚报》4.25 蔡发 陈权/文)

（此处为排版占位，无实际内容）